



西周中期 邢季尊

通高：一七·二公分
故銅：三三九

青銅尊的用途為盛裝美酒，是商周時期舉行祭祀、饗宴的重要角色。院藏〈邢季尊〉器內底有銘文六字：「井（邢）季作旅彝。」說明這件尊是邢國貴族的禮儀用器。該器精巧雅緻，鳳鳥主紋絢麗奪目，為西周穆王時期興盛的樣式。

院藏〈邢季尊〉圖飾分三層，並以細弦紋區隔。第一層為順著口沿向外開展的仰葉夔紋，計有四葉圍著頸部環繞，第二層以浮凸的犧首作中心對稱，左右為相向的長尾鳥紋，鳥身短小，頭上飾綬帶式冠羽，身後拖著尾羽向後延伸，末端向上回勾捲曲，如此形成兩組帶狀圖飾。第三層同樣以犧首中線為準，兩旁為各自回首的大卷尾鳳鳥紋，其主要特色是冠羽和尾羽滿鋪心形翎眼，毛羽垂及地面，猶如孔雀開屏般華麗隆重。全器主紋間佈細密捲雲紋，底部圈足飾以兩道粗弦紋，簡潔穩固的承托全器。整體而言，該器所飾大鳳鳥引頸昂首，足爪蒼勁，雙翅向上挺立，花翎閃耀，顯得精神煥發，姬周決，具有強烈的時代氛圍。（張 莅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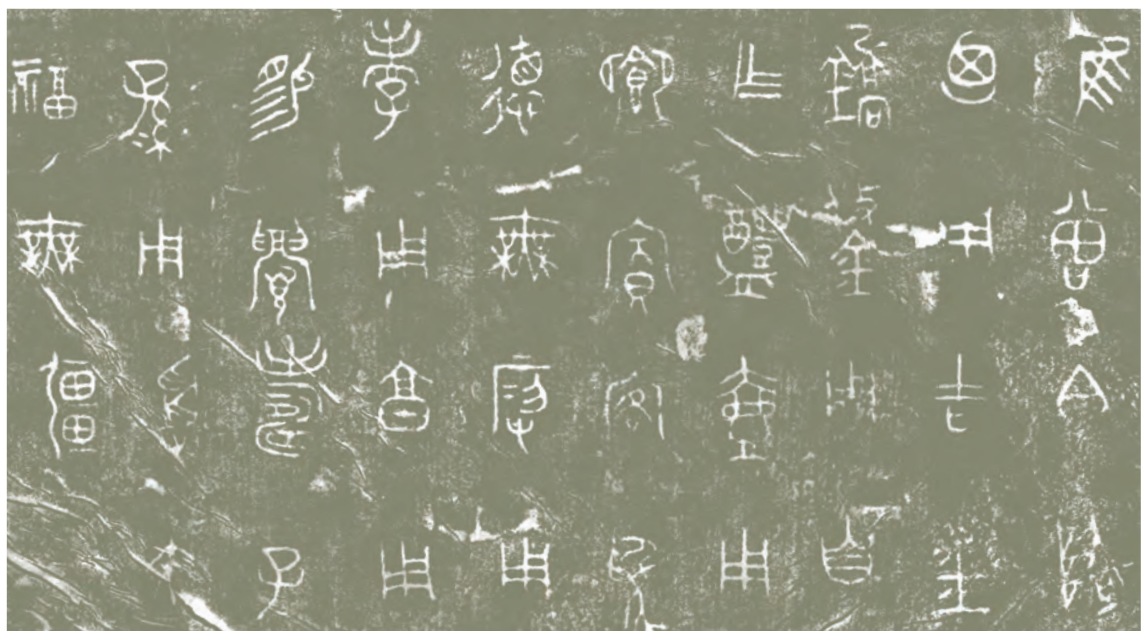


商晚期 嵌綠松石獸面紋鉞

長：一〇·八公分
鑄銅：一〇七

青銅鉞流行於商代至西周，是一種作戰用的兵器。院藏〈嵌綠松石獸面紋鉞〉肩部一邊寬一邊窄，肩上一個窄長孔，與內部的圓孔搭配，將長木秘安裝在肩部與內部間的淺槽，可手持劈砍使用。雖然鉞是作戰使用的兵器，但這件銅鉞卻異常精緻。鉞身上半是兩個夔龍，耳朵以浮雕方式表現。中孔設計成帶有獠牙的獸口形。鉞身兩側飾以如青銅禮器上所見的勾角扉稜。最為特殊的是，內部頂端以細小的綠松石拼嵌出方框以及框內的獸面。獸面的眼睛還特別以立體的方式表現。

鉞在商代是軍權的象徵。扉稜、浮雕動物以及綠松石鑲嵌都是商代晚期高級貴族器用的表徵。這些元素出現在這件兵器，以及外撇的弧刃沒有使用過的痕跡及減損，說明這件器物應該是做為禮兵器，於儀式中使用，而非作戰用的兵器。（吳曉筠）



青銅壺的流行時間跨度大，由商周至西漢皆可見其蹤影，作為盛酒容器，除了用於祭祀，自然也是舉行饗宴時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院藏〈曾伯淩壺〉有銘文四十一字：「唯曾伯淩用吉金鑄，用自作醴壺，用饗賓客，為德無瑕，用孝用享，用賜眉壽，子子孫孫，用受大福無疆。」內容說明曾伯淩製作酒壺宴饗賓客，有人認為他是將舊有的銅器鎔毀，新鑄成「醴壺」。根據文獻記載，「醴」是一種未過濾糟粕的薄甜酒，放置隔夜即可熟成，說明該壺用於盛放這種簡易釀造的醴酒。

這件特製的〈曾伯淩壺〉，除了通體曲線流暢之外，還配上蓮瓣形的器蓋，以及左右兩側的獸首銜環，讓全器益顯典雅莊重。在紋飾方面，器蓋頂端為雙龍盤繞，蓋身和頸部同飾竊曲紋，器口和腹部作多環帶紋，圈足搭以垂鱗紋，整體呈現西周中期之後，青銅器紋飾的全新簡潔明朗風格。

如此大費周章鑄新器，曾伯淩除了用來宴饗賓客，還分別將上述銘文鑄在該壺的器和蓋上，希望可以行德無過，享孝先祖，子孫永保，最後福壽長全。湖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出土〈曾伯淩鉞〉，銘文揭示用為民刑、民政之典，可知器主曾伯淩曾活躍於兩周之際的南方地區。

（張 茲）



西周晚期
曾伯淩壺

通高四一·二公分
故鑄三七四



鈚出現於戰國中期，一直流行到漢代。器型是將圓形的壺改成方形，可用來裝酒或盛水。

戰國時代的貴族喜歡將生活的美好以寫實的方式表現出來，通過這件〈狩獵紋鈚〉，便可一探戰國貴族的日常。除常見於同時期銅器的紅銅片瑞獸及梭形鑲嵌，這件器物的特別之處在貴族休閒生活的圖像描繪。在最上層的宮室宴樂中，梳著雙髻的貴族們在兩層樓的宮殿中飲酒作樂，二樓中間有一位吹笙的樂手。器腹中段是車馬狩獵主題，駕著駟馬車的貴族兩人一組，伴隨著飄揚的旌旗及矯捷的獵犬，在郊野獵捕野豬、兔子及鹿等動物。在左右下角，勇敢的勇士與獵物近身搏鬥。最下層近圈足處為採桑圖，圍繞著兩棵桑樹，有人在摘取葉子，有人拿著桶子整理，分工合作。溫馴的小狗穿梭其間，恬適怡然。這些寫實的圖景將貴族們歡愉、刺激及閒適的生活氣氛具體呈現，感染著觀賞者的心情。（吳曉筠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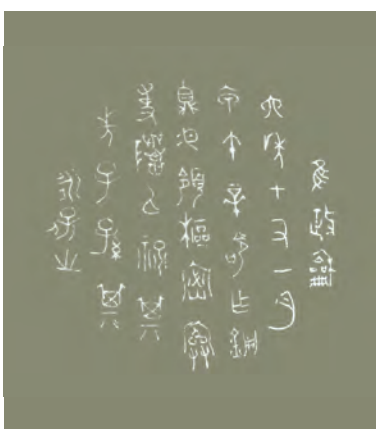
戰國早期 狩獵紋鈚

高四五·三公分
故鑑三三七二



宋代人文思想煥發，歷經儒學的新闡述與古文寫作運動，不論朝野，都立足於中國早期經典，企圖將三代精神文明重現與再生。宋徽宗時，官方大量製作仿古儀式用具並舉行相關祭典，除了促進工藝發展，也引領金石研究的風潮。

〈政和鼎〉為政和六年（一一一六）所鑄，是宋徽宗賜予當時的政志明童貫，作為祭祀祖先的廟堂祭器。全器仿造商末周初之銅鼎樣式，為兩立耳、圓腹、三柱足，腹身以稜脊作間隔，裝飾著三組高浮雕的獸面紋，背景以雷紋為襯。器內底鑄有銘



文三十三字，內容為「唯政餘六年，十又一月甲午，帝命作銅鼎，易（賜）領樞密院事貫，以祀其先，子孫其永保之。」該鼎雖力求呈現商周銅器樣貌，但於鑄造方法和銘文書寫仍不免透露宋代特色。宋徽宗大規模地重塑三代精神，學習周文化的九鼎制，君臣關係也循周天子賞賜有功臣士的模式展現。〈政和鼎〉說明了宋徽宗以古器型制為今器的意圖與實踐，而青銅器作為商周文化之象徵，也於宋徽宗敕編《宣和博古圖》後，為金石之學添入燦然的扉頁。（張 苙）

北宋 徽宗 政和鼎

高三八分
中鑄四三七

新莽至東漢 仙人不老博局鏡

徑〇·三六分
中鑄五九八



銅鏡自古即被賦予極為神秘的力量，除用來照容，更是黃帝神物、道士法器，以及一般人的辟邪用具。這種神秘性的理解主要來自於漢代流行的讖緯學說，並極致展現在兩漢之際

流行的博局紋鏡上。此件〈「仙人不老」博局鏡〉便充分體現漢代對神秘世界的想像與探究。這面鏡子以鏡鈕為中心，同心圓方式排列紋飾。最中間是帶有十二干

支銘文的方格，周邊平均分佈著T、L、V及乳丁紋。這種安排採自於戰國時代即已出現的六博棋盤格局。除做為對奕遊具外，據江蘇連雲港市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，這種棋盤同時可做為占卜的工具。因此，將具有靈力的棋盤圖像做為銅鏡的圖案，希望能藉之達到避邪的效果。在棋盤格局間的，是充斥於天地間的神靈動物，展現神仙世界的樣貌。主紋飾區外為一周銘文：「尚方做竟（鏡）真大巧，上有仙（人不知老），徘徊名（山）采芝草，渴飲玉泉飢食棗，壽而金石，由天下教四海。」除歌頌尚方鑄造銅鏡的能力，更具體表達漢代人所追求的長生不老及仙人生活。

此鏡收儲於清代乾隆皇帝的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一冊》鏡匣冊頁，為《西清續鑑·乙編》所儲一百面銅鏡中的上上第一，可見乾隆皇帝對之喜愛有加。（吳曉筠）



乾隆皇帝喜將珍愛的物品聚集在一起，並繪製畫冊，共置於一木匣中。此組以古銅器為主題的「範金作則」匣，便是一例。匣內原儲小型銅器十件，每件配有精美的紫檀木座。其中一件為咸豐皇帝移作他用，故現存九件。

「範金作則」為「以古銅器為典範」之意。據畫冊所示，匣內銅器以周、漢、唐等時代為名，表現出對古代銅器的重視，其中三件更錄於乾隆皇帝敕編之《西清續鑑·甲編》古銅器圖譜中。但究之原件，實由商周古銅及明清仿器相摻而成。功能配置上，則是將古銅意象轉化為宋代以來流行的成套文房用具。周、漢古銅為名的銅器為香爐、花瓶及水盂，以唐為名的蟾蜍形器為硯滴，展現宋、明以來好古文人所愛的文房配備。花香、墨香與薰香共融一室，再加上改製商代弓形器、西周鑾鈴、及商式銅戈等案頭賞玩古銅器，盡顯文人書房別具古意的氣息。（吳曉筠）

清 乾隆 範金作則古銅文玩匣

故銅四五二四六、故雜四一四

北宋 徽宗 夷則鐘

高一八·二公分
中銅七四二



宋徽宗實現三代精神的具體措施為建立禮樂制度，用於政治、社會秩序的規範以及人民的心智教化。宋徽宗於即位之初，便亟思「雅樂」，以春秋時期的青銅編鐘為式樣，製作成套樂器「大晟編鐘」。崇寧四年（一一〇五）完成「大晟新樂」，隨後設立掌管音樂的專屬機構「大晟府」，將失傳已久的三代古樂，重擬出十二律。

〈夷則鐘〉為「大晟編鐘」中的一件樂器。為平口式，鐘鈕為相向的雙龍造型，器身以交錯的立體蟠虺紋裝飾。鉦間鑄有銘文，一面書十二律中的「夷則」。經過現代測音，為升G調。另一面銘文為「大和」，原應為「大晟」，可能是靖康三年（一一二七）金人掠奪宋朝宮中樂器，將「大晟」刮去，改為「大和」。「大晟新樂」為宋代對於商周禮樂文明的追求與理解，〈夷則鐘〉則見證了宋徽宗及其官員對於古樂的詮釋和成果展現。（張 菘）



喀什米爾
坐佛

七世紀
高一九公分
購藏二七

此尊挺拔的佛陀著貼體袈裟結跏趺坐在蓮花座上，雙手作轉法輪印表示正在說法。蓮花從幾何狀的岩石中生起，座前蹲踞兩隻獅子，此乃以「獅子吼」譬喻佛說法。台座底下一圈以 Sarada 字體刻寫的梵文題記（部分斷裂）：

此為 Navasurendra 大王統治的第二〇（或二九）年，由國王總管之子、具大誠信之優婆塞（居士）Varṣa 同其妻 Sini、Girnarasingha，與其子 Singha 和 Sini（出資施造）。

整件作品以黃銅澆鑄，雙眼與嘴唇分別嵌銀與紅銅。台座兩側跪姿人物，即為題記所言之各供養人。

Navasurendra 為吉爾吉特（Gilgit），今屬喀什米爾突厥人所建立的 Palola Śāhi 王朝（西元四～八世紀中，唐代史籍稱「勃律」）的國王，該王朝崇奉佛教，藝術風格同喀什米爾谷地，乃在笈多（Gupta, 320-540）美學中融入當地自古以來犍陀羅（Gandhāra）造像挺健的傳統，稍為鼓起的眼睛與抿嘴淺笑成為其地區特色，以不同的金屬成分表現色彩變化也是該地區常見的裝飾技法。

此件不僅造型優雅內斂，依年代換算製作於西元六四五或六五四年，為七世紀喀什米爾造像的重要作例，更是現今所知此地區少見紀年造像中第二古老的作品。（鍾子寅）

大理國 易長觀音菩薩

十一世紀
高五四·三公分
鑄銅

此尊立姿菩薩頭戴華麗寶冠，身飾繁複瓔珞與天衣，右手舉起於胸前，左手下垂持握淨瓶，瓶中插了一支蓮花（部分殘損）。值得注意的

原應持有楊柳枝。根據李玉珉的研究，美國維吉尼亞美術館與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也有此尊觀音造像，從風格判斷，它們均屬於雲南大理國（九三七～一二五四）造像。

是：冠葉上以五方佛為飾，腹前圓形飾板浮雕佛涅槃圖，瓔珞垂飾於兩腿間有坐佛三尊像。此圖像頗罕見，比對本院所藏大理國張勝溫（十二世紀）〈畫梵像〉卷，可知其名「易長觀（世）音菩薩」，舉起的右手

與（一一七二～一二〇〇在位）等甚至以佛號「易長」為名，張勝溫〈畫梵像〉卷也是段智興敕命所繪，顯現了南詔、大理王室對此尊的信仰。包含本院所藏的三尊易長觀音造像於腿

間佛三尊像兩側均有雙龍瓔珞垂飾，〈畫梵像〉卷之易長觀音所立雲中亦現龍形，或許都呈現了此尊與雲南皇權的關連。（鍾子寅）

據明清地方史料，雲南南詔國（六四九～九〇二）王會隆（八五九～八七七在位）即造易長觀音；大理國主段政興（一一四八～一二七二在位）與段智